

他山之石

前沿观点

公益组织需回应外界误读

上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法治蓝皮书(2014)》。其中的《慈善法治现状与完善报告》调查结果显示,抽查的15家慈善组织中只有5家公开了2012年审计报告,对于捐款总额只有两家给出了具体数字。这个热点立刻得到了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但是,这个数据真实吗,这个数据确凿吗,不公布数字的问题在哪里,公益组织该作出什么样的改变。面对外界有评论意见的时候,尤其是指出一个严重问题的时候,最好的态度当然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当然,面对前文提出的问题,很令人遗憾的是,文章的作者将注意力放在了公益慈善组织的透明公开上,但是对于公益组织行业的问题确实有不了解之处。因为审计报告中是肯定有捐款总额的,因此如果有5家机构公开了审计报告,那么就意味着至少有5家机构同样对捐款总额给出了数字。

面对媒体报道中出现的这样一个技术性问题,非行业类媒体不加核实就作了报道,也造成了影响,但为何公益同行们对这个问题如此的冷漠。公益慈善行业的整体形象受挫,并不仅仅是一个或者几个孤立的事件就构成的。目前公益慈善行业的发展还比较初级,对社会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也非常弱小,让绝大多数人了解公益慈善行业的窗口,不是去做志愿者,不是去直接加入到组织之中,也不是和身边公益从业人员进行交流,几乎唯一的窗口就是传媒了。而留给公益组织全面呈现的媒体窗口又实在是少的可怜。为此,普通人每天耳濡目染的,并不是公益从业人员每天都在殚精竭虑推进社会进步的脚步,而是公益慈善行业摔倒的每一步,甚至类似这次事件一样,又一次被行业外人员的误读。

在这样一个转型时代,是默默地接受社会的误解,还是等待媒体报道更加专业化?前者不可取,后者不可靠。既然公益组织从业人员都立志要改变社会了,改变社会观念也是自然的。那面对外界误读的时候,不能再沉默了。现在公益组织不主动表达,就没有未来社会对公益的了解。(姚遥)

老牌公益项目照样焕发活力

近年来,我国公益组织老牌项目面临“前有强敌,后有追兵”的情况。所谓“前有强敌”,指的是前头还有不少同样类别的老牌项目,短兵相接。所谓“后有追兵”,指的是随着壹基金、免费午餐等一大批新兴组织的兴起,老牌项目的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其业务发展和业绩增长双双面临困境。

那么,老牌项目是否就真的没有指望了呢?笔者以为,只要做好如下几点,老牌项目照样能够风光无限:

第一,重新定位市场,寻求品牌演进的新方向。品牌学大师戴维·阿克提出:“一个品牌可以通过逐步演化变得富有时代气息,同时不会显得陌生。”对于公益组织而言,要想自己的老牌项目不被时代所遗忘,就必须重新调研市场的情况,并从名称、符号、项目内容、品牌形象内涵等角度切入,实现品牌形象的演进。

第二,摒弃老套的宣传手法,学习运用新的媒体传播方式。老牌项目应该尽快摒弃过时的宣传手法,学习采用事件营销、话题营销等一系列全新的传播方式,以不断扩大自身之社会影响力。

第三,了解新兴人类的特点,采用新的募捐技巧。老牌项目要采用新的募捐技巧,但这些技巧不该随意采用,而应在了解80后和90后捐赠人特点的基础上。比如,这些人最喜欢的活动方式,其最关注的热点话题,等等。在了解到这些人群的情况后,老牌项目可以采用O2O模式、众筹模式等新的募捐方式来筹集资金。(褚莹)

泰安打造“菜单式”志愿服务

泰安市地处五岳独尊的泰山脚下,北依山东省会济南,南临孔子故里曲阜,辖6个县(市、区),人口556万。近年来,泰安以“推进富民强市、建设幸福泰安”为目标,以争做“泰山文明使者”为载体,在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方面进行探索和创新,打造出特色鲜明的菜单式志愿服务模式。

推进志愿服务大合唱

作为著名的旅游城市,泰安市志愿服务工作具有比较扎实的群众基础。进入新世纪,民间志愿服务组织如雨后春笋,发展迅速,异常活跃。但是,由于缺少统一的组织协调,志愿服务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运动式的服务多,常态化的服务少,逢年过节各类志愿服务组织的活动经常“撞车”。如何整合志愿服务资源,促进志愿服务健康有序开展,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2007年,中央文明委出台《关于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意见》后,泰安市率先成立了由市委领导任组长的志愿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同时,成立由市委文明办牵头,民政、工会、团委、妇联、红十字会等单位组成的志愿服务工作协调小组。注册成立

“泰山文明使者”志愿服务协会,吸收团市委、妇联、红十字会等志愿团体参加,由民间志愿组织负责人担任副会长和理事,从而实现了各类志愿组织有机融合,形成了志愿服务的“大合唱”。

创新“菜单”服务模式

在志愿服务推进过程中,一个突出的问题也显现出来:许多有专长的志愿者缺乏服务平台和服务对象,而一些需要帮助和关爱的群体、个人又缺乏志愿者的信息资源,从而造成志愿服务供非所需。针对这种情况,泰安市通过调研,创造性地提出了“菜单式”志愿服务模式。

“菜单式”志愿服务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将具备一定专业特长的志愿者信息汇编成册,发放到社区、村镇,让居民像进饭店“点菜”一样选择志愿者提供服务。通过“配菜”、“点菜”、“送菜”和“品菜”四个环节,形成了一套规范的志愿服务、管理、评价、考核体系。该市在第一批近千名志愿者人才资源库中,精选了50名具备国家专业资格认证的志愿者,将他们的专业特长、服务时间、服务项目等信息登记注册,印制《社区“菜单式”志愿服务志愿者

名录》。居民只要拨打8301111热线电话,就能找到自己需要的志愿者。“泰山文明使者”志愿服务协会为志愿者提供《社区“菜单式”志愿服务登记卡》,协调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结束后,根据居民意见,被服务社区负责填写《社区“菜单式”志愿服务评价卡》,对志愿者志愿服务的态度、质量、时间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在顺利推进“菜单式”志愿服务的基础上,他们向社会公布了一批“泰山文明使者”志愿服务基地,列出志愿服务需求、服务项目、服务岗位和服务对象。各志愿服务组织自愿报名,与基地进行双向选择,由协会组织他们签订志愿服务协议,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市社会福利院被列入“志愿服务基地”后,先后有12支志愿服务组织与其签订协议,定期开展健康体检、心理辅导、生活照料、文体指导等志愿服务活动,常年为200多名孤寡老人、残疾儿童提供周到便捷的服务。

营造全民参与氛围

实践证明,要使志愿服务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围绕党委、政府的

工作大局,激发人民群众的内在动力,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我参与、我奉献、我快乐”的浓厚氛围。

围绕大局开展活动。围绕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泰安每年确定一个志愿服务主题。2011年,围绕“创建文明城市”,举办声势浩大的“文明城市全民共建”志愿服务活动;2012年,各级围绕“学雷锋”、“三关爱”等主题,设计具体项目和活动3000多个。

加大宣传营造氛围。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开设“泰山文明使者”志愿服务专栏专题,宣传志愿服务理念,集中报道志愿者的感人事迹,对志愿者进行访谈,刊发志愿者心得体会;举办志愿服务主题演讲、征文比赛、知识竞赛等活动,动员广大志愿者走上讲台、走进屏幕、进入网络,宣传志愿服务知识、谈志愿服务感悟、谈志愿者的人生追求。

树立典型形成导向。每年通过社会推荐、媒体公示,评选表彰20个“泰山文明使者”优秀志愿服务组织和10名金星志愿者、20名银星志愿者和30名铜星志愿者。这些先进典型以其感人事迹对弘扬志愿服务精神、引领社会风尚发挥了重要作用。(网摘)

感谢红十字“救死扶伤”

3月26日,绍兴市柯桥区稽东镇雄鹰村村民葛尧根刚出院便和儿子一起赶到市红十字会,向傅亮微、吴陈威送上锦旗,感谢她们的“救命之恩”。

原来,1月22日下午,葛尧根遭遇车祸,当场昏迷。恰在这时,市红十字会卫生赈济处的傅亮微、吴陈威途经事发地。她们当即下车,一边拨打120,一边对葛尧根展开现场急救,直到救护车来临。葛尧根的主治医生陈建亮说,红会工作人员及时拨打120,并采取正确的院前急救措施,为挽回葛尧根的生命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绍兴 摄



纪念中国红十字会 建会110周年

中国红十字会诞生“三部曲”之二：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宣告成立

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红会组织,不可能取得国际红会组织的确认,更得不到交战国的认可。时论呼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红会组织。1904年3月5日,《申报》发表文章《中国宜人红十字会》指出,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只是“中国红十字会之先声”,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红十字会,当局应紧急创设红十字会以救难胞,并报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核准,使中国成为国际红会大家庭一员。

救援急如星火,创办红会组织同样急如星火。红十字会是群众性组织,理应由民间发起,尽管清政府对中国加入国际红会态度积极,但不能一手包办。历史的重任还是落到沈敦和等慈善家身上。他找到李提摩太,请求帮助。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英国传教士,1870年受英国浸礼会派遣来华,先后在山东、东北、山西等地传教,1890年在天津主办《时报》,1895年在北京参加康有为领导的强学会,对中国的维新运动极表赞同,1898年拟出任光绪皇帝的顾问,

因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而未成。他是在华传教士中极具影响力的人物。

对沈敦和之请,李提摩太表示万苦不辞,鼎力相助。令人振奋的是,李提摩太卓有成效的活动,使尴尬的局面出现转机,朝着成功的方向迈出关键的一步。李提摩太追述这一过程时,不无感慨地说:“上海华商绅官,深念旅居北方华民之苦,故彼此筹谋拯救之法,特请沈敦和观察前来与余商量此事。查各国在东三省教士避难于牛庄。余遵沈观察之请,电商牛庄教士可否拯救难民?旋得复电,允许前往赶救,愿效力者甚众。因此设立红十字会之议始起。红十字会之用意,救被难民人与受伤兵士。遂往商英、法、德、美四国领事,金以为然。然后又往商工部局董安特生,安特生因属余与总董培恩商议之后,始定。”

1904年3月10日,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当天下午5时许,中、英、法、德、美五国代表会集于上海英租界公共工部局议事。会议由工部局值年总董培恩主持。培恩致开

会词:“今日五国董事聚集于此,所为何事?我请李提摩太宣明。”李提摩太起身,简明扼要述说沈敦和等急救东北难民请求援助情形,说:“今日之会拟先在中国设立红十字会分局,设局之意,首在筹款。惟所筹之款,并非交付俄人日人支用。且将来拯救难民,不分中外。”接着,沈敦和介绍东北难民嗷嗷待救苦情:“上海拯救难民之诸华董,闻战地左近惨酷之状,预拟极力设法拯救。中国已有多人允资助华董,最妙者请诸洋董合力办理。”对李提摩太在中国设立红十字会的提议及沈敦和合办红会的设想,与会者均无异议。培恩请工部局董安特生“定议”。安特生提出,“所议创设红十字会,系局外之会”,“宜预举各董及派定办事之董事数人”,“共襄此举”。安特生宣布了他与李提摩太议定的45名董事会组成人员名单(其中西董35人,华董10人),大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另从45名董事中推出9名组成办事董事(其中西董7人,华董2人),西董为英利司威金生、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法租界工部

局总董、李提摩太、律师麦尼而、医生巴伦、傅密生,华董为沈敦和、施则敬,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由于与会者多为洋人,会上使用的正式语言是英语,李提摩太“复将会议大旨,用华语告知在场诸华董。”会议记录也是用英文,由精通英文的施肇基(字植之,杭州人,使馆翻译,民国时任驻英、美公使)秉笔,后译成中文,“分送在场各华董及来探问情形者”。会后以《施君肇基笔译上海创设万国红十字支会会议大旨》为题,登于《申报》、《中外日报》。

这次集会,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宣告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也标志着红十字会在中国的诞生。

红会之设,“首在筹款”,否则,救援行动无从谈起。3月11日,各华董集会后于丝业会馆,决定“先行筹备五万金,以期及早开办。”

3月17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办事董事英按察使威金生、工部局总董安特生、律师麦尼而、医生巴伦、李提摩太、沈敦和、施则敬等,聚于英国按察使署议事,议定筹款办

法,决定国内、国外同时并举,华董、西董分别筹措。

3月29日,吕海寰(1842—1927,字镜宇,山东莱州掖县人,1897年被任命出使德国大臣,回国后官至工部尚书,1902年任钦差办理商约大臣),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江苏武进人,当时屈指可数的洋务企业家。1902年出任会办商约大臣、办理商税务务大臣)、吴重熹(1841—1921,字仲怡,山东海丰县人,朝廷大员,鼎力支持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开办与运作)、沈敦和、施则敬等联名的“拨助捐款”的通电发往各省后,又在4月2日《申报》登出劝捐启事。劝捐呼吁得到各省当局的积极响应,短短的一个多月,广东捐助2万两,盛京将军增祺助银万两,两江总督崧骏平银8千两,清江漕运总督3千两,湖北、湖南、江西、山东各万两,河南、陕西各5千两,天津2万两等。民众捐款也十分踊跃,从《申报》连篇累牍的“捐款清单”中,我们不难想见各界涓滴助赈的感人场景。

政府的支持和各界人士的广泛

参与令人鼓舞,但上海与东北相去遥远,救援行动的实施,只能由分会力任。4月6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添设的第一个分会在辽东牛庄宣告成立,接着新民屯、沟帮子、辽阳、开原、奉天、铁岭、安暑河、海城、山海关、塘沽、烟台、金陵等地分会纷纷添设。随着分会的次第添设,大规模的救援行动逐渐推开。红十字救护“出险”行动,历时一年有余,131177名身陷险境的落难同胞得以转危为安。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及其分会,救助日俄战灾,历时三载,救护出险、收治伤病、留养资遣、赈济安置总人数达46.7万人,因伤重不治而亡者仅331人。“此次救护工作,得到教会和医院以及中国官方最高的合作,所以成绩特佳。”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红会中西办事各董及救难人员不支薪水,他们以崇高的奉献精神,救死扶伤,扶危济困,默默实践着红十字赋予的人道圣职。他们的业绩,在白山黑水的辉映下,熠熠生辉,光彩照人。

(池子华 郝如一)